

■本报记者 徐健

普通人的视角才是创作者最需要关注的

——访全国政协委员、剧作家王丽萍



中国电视剧始终与时代同行

记者: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创作足迹,您认为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有哪些电视剧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丽萍: 从1958年《一口菜饼子》开始到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制作、播出以及对外影响,中国电视剧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百姓人家日常最主要的娱乐与观赏。这60年的成就是令人欣喜的,也是催人奋进的,前辈和同行创作出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比如《渴望》《孽债》《金婚》《亮剑》《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民的名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特征的作品,有一点是共通的,它们构成了中国历史、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艺术画卷。从《渴望》到去年播出的《鸡毛飞上天》,可以从电视剧的表现内容看到我们国家生活的变化和新的矛盾与现实。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电视剧创作始终是与时代同行的,紧紧追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对这个时代的贡献所在。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电视剧涌现出来。

记者: 改革开放40年来,现实题材一直是电视剧创作的重镇。前不久,中国视协发布了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的征集活动,目的就是加大现实题材创作的扶植力度;无独有偶,业内更是把2018年看作是“现实主义回归年”。结合您的创作,您是如何理解现实题材的,又是如何看待“现实主义回归”的?

王丽萍: 举办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的征集活动,对广大编剧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反映了相关部门、领导对现实题材创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给了所有编剧一个平等的机会。不管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编剧新人,还是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历和作品积累的成熟编剧,还是依然笔耕不辍、坚守在创作一线的资深编剧,你都可以把作品提交上来,接受检验。在我看来,不管是扶植、奖励,还是倡导“现实主义回归”,现实题材创作最大的意义在于记录当下中国的历史,记录新时代。如果你能用你的笔墨、影像、画面真实表现,刻画新时代里的社会生活、精神追求、人生命运,相信好的作品是能流传下去的。编剧就是一个在当下生活的书写者,他应该具有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离出本质、本真的能力,要有透视生活、分析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这正是写好现实题材的基础。而真情实感的表达,对生活的敬畏,对写作的敬意,都会潜移默化体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记者: 您在进行现实题材创作时,更多希望跟观众分享哪些内容?

王丽萍: 现实生活中,包括我们身边存在着很多动人的故事。这些年来,有朋友说我是“以温暖现实主义的方式讲述动人的故事,表现美好的人生、励志的人生、奋斗的人生,特别是小人物的中国梦”。其实我每一次的写作,都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写作其实是孤独而艰苦的过程。在创作中,我一直相信,正能量的作品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积极、健康、乐观等影响,尤其是中国电视剧的观赏通常是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合家欢”式的收看方式居多,这就更需要为他们提供有意义、有价值、有内涵的东西,这是电视剧创作者的责任所在。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短板与长项,对我而言,我比较偏爱喜剧的呈现,虽然轻喜剧的表现形式非常难,这就需要你谦虚的学习与长期坚持不懈的写作,如果您坚持下来了,就做到自己挑战自己了。除了认真真写作的本分以外,持之以恒、不放弃、不埋怨的努力也是我们这一行真诚的热爱态度。

扎扎实实写百姓的故事

记者: 目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难度在哪里?

王丽萍: 就我的创作经历而言,这些年的写作我也遇到了很多创作的瓶颈。2000年前后,我的创作瓶颈主要就是“茫然”,我不知道去写什么,但是又特别渴望去表达。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像“热锅上的蚂蚁”,彷徨、焦虑、不知所措,那会儿心里很想表达,但就是找不到视角。在经历了四年多痛苦的状态后,我决定不与制作方签合同,自己沉下心来,想明白了再写。而且一定要有感而发,或者感同身受。2004年以后,我陆陆续续写出了《错爱一生》《保姆》



《媳妇的美好时代》《双城生活》等,在我熟悉的生活领域里去寻找我亲切的生活,写我周围的生活,而且,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那个时候,有人说:不就写点婆婆妈妈的事儿吗?能有大出息吗?我觉得,普通人的视角才是创作者最需要关注的,平凡百姓的生活,小人物的励志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家长里短的温暖,左邻右舍的帮衬,这些故事热乎乎的,非常温暖,你用真诚的感情去抒写去表达,等在荧屏上播放以后,观众的反响才让我跨越了这个创作瓶颈。所以我一直这样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就是扎扎实实写百姓的故事,写人间的真善美。



在我看来,瓶颈对创作者来说不是坏事,至少对我而言,让我有一个思考与冷静的过程。目前对我来讲,也面临一个瓶颈,那就是在写作《国民大生活》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在重复自己了,这非常可怕,我想,是不是我写不出来了?我在炒冷饭了?我缺少敏感了?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跟导演夏晓昀和两位年轻编剧鲁琦、张洋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认真总结了这部作品的失误所在,分析了哪些问题是应该避免的。实际上,戏剧冲突的重复、戏剧性转折的雷同或者人物塑造的痕迹过重,这些创作的难点,不止发生在我的身上,同样是很多编剧也会遇到的难点。尤其是对于现实题材而言,当写到重大情节转折的时候,要么是车祸,要么是关键人物去世,很多戏都形成了套路。我认为,成熟的编剧首先要正视自己的问题,不逃避、不遮盖,其次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如何去克服,怎么战胜这些问题,这次全国政协会议闭幕,我们回上海的时候,我在候机室跟姚明聊天,我说你如何看待当下电视剧里的体育元素?或者是体育题材?姚明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他说,“你写的媳妇,可能很多媳妇都会感同身受;那如果一部体育题材,又如何让每一个观众有感同身受的情感呢?”我觉得他太智慧了,的确我们在创作中,找寻让观众情感共鸣的视角、故事、人物,不仅陪伴在编剧漫长创作的始终,也是一个编剧的功课。所以,每一个瓶颈,也许也是一次机会,让你放下一些,重新出发,一个好的编剧,应该有重头再来的勇气。

记者: 您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去克服和战胜这些问题的?

王丽萍: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提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对正处在成长中的编剧来说,奋斗精神同样是不可缺失的。编剧一定不要被内心的障碍和害怕吓倒。此外,勤奋、刻苦也是编剧必须具备的素质。从上世纪80年代,我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到现在写电视剧,一直写到现在,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真的是因为热爱,我看我们同行高满堂老师、王宛平老师等,都是一直在创作一线坚守着,刻苦勤奋是一切创作的基础,你在作品中真情实感投入多少,剧本中就会体现多少。在创作中去克服困难,除了你的毅力外,应该多交朋友,多学习,多请教,多开阔自己的世界。几年前我去体检,医生看着我的手表,你的手写坏了,小手指已经不能正常与五指合拢,我看着自己的手,笑了:这样也很不错哦,至少跟别人不一样啊。

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与充沛热情

记者: 优秀的、经典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常驻观众的记忆,除了作品本身的生活质感、时代质感以及与大众的情感共鸣外,离不开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改革开放以

来,电视剧艺术长廊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典型形象,形成了电视文化独特的人文风景。在塑造人物、塑造典型形象方面,您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

王丽萍: 我这里首先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编剧王宛平老师写的《金婚》中的人物形象。剧中,小学数学老师文丽几十年来人物的脉络、性格转换的过程非常清晰,很多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戏,她的丈夫佟志跟别的女人在喝咖啡的时候,文丽正在给她的婆婆洗脚,这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她写出了一个人的内心力量和善良。我在写《媳妇的美好时代》时,有一场戏里婆婆曹心梅生病了,有点中风的感觉,毛豆豆不知道怎么照顾她,就给她端了一杯牛奶。此时,曹心梅斜着眼盯着毛豆豆说:“你是



不是特恨我。”听到这句话后,毛豆豆就不停地在那里哭。曹心梅又接着说:“多大的委屈让你哭成这样。”这段对话展示的就是非常微妙的婆媳关系,既透露着一点委屈,又是亲人之间相互坦诚的一种方式。至今很多观众对这个情节记忆深刻。《双城生活》里,有一场戏写得非常痛苦,按习惯吧,北京人是中午结婚,如果晚上结婚就是二婚了,恰恰上海人是晚上结婚的,那么在剧情里,我如何让剧中的两家人都满意呢?这段戏我写了一周都没有憋出来,我当时跟导演安建商量,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安建跟我说,你将心比心吧,如果



你是剧中的家长那您怎么办?最后我就盯着闹钟做文章,男女主角是在上海结婚的,在婚礼上,男主角徐嘉惠有一段表白:“现在,请各位来宾,我们把时间调到12点……此时此刻,我宣布,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我跟郝京妮在这里举行婚礼。”一个时间解决了两地婚礼习惯的不同,(据说看了电视剧的朋友,还有人仿效这个情节)毕竟生活中,南北差异的习惯我们要尊重,但是戏剧的表现形式也需要出效果。这些创作都是来自生活。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写出让人感动的细节、人物、思考、敏感以及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充沛热情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 如今,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国故事”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家的观众认可、接受,但是需要做的功课还有不少。结合您的作品“走出去”的经历,您认为,中国电视剧走向海外,还需哪些努力?

王丽萍: 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模式有很多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把广播影视“走出去”作为工程,将中国电视剧送到各个国家的主流频道去播出,让不同国家的观众了解中国文化。另一种是制作单位、公司自己翻译,在国外电视台播出,还有其他的模式……有一点特别有趣,在我的“走出去”的作品中,家庭生活剧、都市情感剧居多,国外观众反馈是很喜欢,他们也有家长里短、邻里关系,也会遇到工作的烦恼、情感的冲突,认为我们的作品很容易跟他们的情感产生共鸣。现在,《媳妇的美好时代》已经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反反复复播放,2014年,我编剧的电视剧《我家的春夏秋冬》作为“海派电视剧”在纽约美国中文电视台展映,配上了中英文字幕,受到当地观众欢迎。2017年,我编剧的《大好时光》在日本长崎电视台播出,该剧原本38集,为了方便日本的播出方式,特地精简为11集,中文配音日文字幕,在长崎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当地观众的极大关注。因为播出时段是下午,很多上班族无法准时观看,甚至用录像机录好下班后追剧。同一年,我编剧的《生活启示录》在蒙古国家电视台播出,打败了同期的俄剧、韩剧,以及蒙古当地剧目,连续20日夺得全国收视冠军。这部作品还被译制成阿拉伯语,并由阿语频道推

广至突尼斯国家电视台、约旦国家电视台、黎巴嫩国家电视台、埃及国家电视台一台、摩洛哥国家广播公司等7个国家的8家电视台。在我看来,电视剧“走出去”首先要解决好翻译的问题;其次,要加大宣传和推广的力度,传播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展;第三,“走出去”应不仅局限于电视剧作品的输出,也包括和其他国家在各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记者: 随着网络播出平台影响力的增强,网络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观众观看电视剧的首要选择。电视剧从传统的电视台播出到现在台网联动甚至网络独播的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电视剧的产业格局。对于当下网络剧的发展,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丽萍: 去年,我在韩国参加第12届亚洲电视剧研讨会的时候,中国的一部网络剧《无证之罪》也被受邀参加。当时大会上有一个环节是请大家互动,我主动要求发言,我告诉现场的300多位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编剧与制作人,我说这部剧在中国业内反响很大,无论从制作和剧作来说,都可以代表当下中国网剧的水准。网络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化到精品化的过程,很多青年电视剧工作者通过网络剧逐渐被这个行业所接纳、认可。网络时代面对的观众更多是年轻人,特别是“90后”、“00后”成为网络剧忠实的粉丝。这就催促着网络剧的创作者一定要拿出负责任的作品,注重网络剧的文化品格,提高创作的艺术水准。网络剧也要按照戏剧规律创作,追求逻辑性、故事性以及情感真实,多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写作是一个漫长的寂寞的过程

记者: 电视剧里原创是难度最大的。20多年来,您始终坚守原创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您认为,目前电视剧原创的难度在哪里?创作题材上还有哪些值得开掘的空间?

王丽萍: 原创作品需要大量的创作素材和生活积累,以及你对社会、人性的深入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中提炼出来所要表达的东西。每次原创我觉得困难最大的是,当我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时,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假。好在我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经历,我当过14年兵,当过5年报社记者、编辑,在合肥电台做过5年晚间热线主持人(兼职),1999年到上海成为职业编剧后,也一直在与各种职业的人成为朋友,下生活这些都是编剧的工作,是必须的积累,否则真的会枯竭的。原创难,我也希望原创的领域更开阔一点,题材更多样化一点。表现在:第一,这些年儿童剧的原创作品很少。儿童剧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尹力导演的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就让我至今难忘。第二,科幻题材的原创电视剧较为缺乏。这里的科幻剧不是古装的玄幻、穿越剧,而是面对当下的书写,这就需要创作者熟悉科学进展,要跟科学家交朋友,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第三,优秀农村题材原创剧特别稀缺。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前不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农村农民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的电视剧原创作品应该及时反映新时代农村的新风貌。第四,表现基层干部、基层工作者的电视剧作品也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特别是居委会干部、街道干部等有很多的生活细节、故事值得挖掘。

记者: 能谈一谈最近的创作计划吗?有没有尝试新题材的计划?

王丽萍: 一部是我与学生鲁琦从去年开始创作的电视剧《理想》,灵感来源于去年年初,我参加第七届十佳上海优秀社区民警的评选,我当评委,一位女警察的故事让我激动不已。很快,我跟鲁琦一起找到了女警察谈心,当然,我们不是写这个真实的女警察,我和鲁琦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觉得要反映一下“90后”女孩子的成长历程,写一些英雄主义的故事,这个社会呼唤英雄主义。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中;还有一个题材,我也焐在心里很久了,那就是写邻居的,而且又有年代的跨度,反映的是30多年邻里关系的变迁,名字叫《我们的邻居》,由我独立创作,我会慢慢写,不急,故事人物要做扎实了,做明白了,目前先把《理想》的剧本磨好了,再回头慢慢写《我们的邻居》。写作是一个漫长的寂寞的过程,真的不要急躁,不要图数量,不要匆匆忙忙上马,想不明白、逻辑不顺会影响后面所有的创作。编剧是基础,我们要做到落字无悔,所以,要老老实实写字、认真真写作。

